

地方记忆的微信生产与传播： 以“广州湾”历史为例

陈虹虹 杨秀英

摘要：“广州湾”是清末法日殖民者对广东湛江的旧称。在微信传播成为社会基本构架的背景下，地方记忆的微信建构成为媒介记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本文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近五年各类微信公众号对“广州湾”历史记忆的呈现。研究发现：参与“广州湾”历史记忆建构的微信公众号日渐多元化；不同类型微信公众号基于不同的记忆使用目的，采用不同的记忆框架，对“广州湾”的历史记忆建构表现出差异化的内容图景、回忆策略和情感态度。研究表明，“广州湾”地方记忆的媒介微信传播需要拓展记忆场所、设立固定的仪式时间并加强与外地媒介的记忆联结。

关键词：“广州湾”；媒介记忆；框架理论；微信

作者简介：陈虹虹，女，讲师，博士。（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湛江，524088）

杨秀英，女，教授，博士。（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财经学院，海南 海口，571126）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0) 03-0081-08

一、引言

地方记忆是地方认同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滚滚洪流对地方认同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地方记忆的构建、重塑、开发与利用无论在现实治理还是学术研讨上都有重要意义。

“广州湾”是清末法日殖民者对广东湛江的旧称。无论是作为租界史还是地方史，“广州湾”都是湛江地方上一段特殊而复杂的记忆，但长期以来在地方公共话语体系中却沉寂无声。直到湛江地方政府将“广州湾”作为文化名片，重新挖掘其社会经济价值，着手打造“广州湾”民俗风情街；“广州湾”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兴起“广州湾”学术研究热潮，有关“广州湾”的集体记忆才借助新媒体重回大众视野。

大众传媒与历史进程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媒体的即时记录上，还体现在将历史带回当下的媒介回忆上。大众传媒不仅为公众提供历史知识和体验历史现场的虚拟经验，还能通过定义历史事件，形塑受众的历史认知。因而，探索大众媒介如何叙述和回忆历史、公众如何使用媒介参与历史建构的媒介记忆学，就成为历史学、文化学和大众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领域。在微信成为大众传播新场域的背景下，研究“广州湾”历史的微信记忆实践，既为媒介记忆研究提供独特的地方案例和新媒体案例，也为地方历史记忆的传承提供理论支持。

有关“广州湾”历史的研究尚处于资料挖掘整理阶段，现有研究多把早期的大众报刊报道作为历史记录的史料证据，少有研究关注当代媒介如何建构和传播“广州湾”历史记忆。本研究采用媒介记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描摹“广州湾”地方历史记忆在大众话语空间中的基本面貌。本文通过对131篇微信公众号文章进行内容和文本分析，着重探讨“广州湾”记忆的媒介叙述框架、情感态度以及记忆协商问题。

二、媒介生产与记忆建构

集体记忆是基于当下需求对过去的建构^[1]，叙事是其建构的基本形式^[2]。因而，许多记忆研究都

把公开的叙述文本当作集体记忆。现代社会,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离不开专门化的机构,大众传媒以公共信息提供者的角色成为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主体。

媒介建构集体记忆的机制一直是媒介记忆学的研究重点,再现是媒介建构的方式之一。杨(Young)认为集体记忆存在于文本之中,媒介通过再现的多寡建构集体记忆层级结构,再现越多则记忆越厚。^[3]媒介通过系统性的选择来凸显、淡化、遗漏甚至改写某些事件,进而建构集体记忆。罗宾斯和安可索(Robins & Aksoy)在分析土耳其电影文化时指出,电影通过突出赞美“自身未被玷污的基础”和“对不能言说之物”保持一致的沉默与压抑,建构了土耳其民族特性与形象的记忆。^[4]坎斯特纳(Kansteiner)则特别指出媒介遗忘的建构作用,德国商业电视台有意忽略德国纳粹历史,改变了德国民众的历史记忆。^[5]

媒介这种系统性突出与遗忘的方式在大众传播中被称为“框架”,因而框架理论成为媒介记忆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不同媒介,由于媒介性质和编辑方针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回忆并不相同。对于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10年后媒体再回忆时,党报采用“公民之死推动法治成就”的成就性框架;法治类报刊则采用“学者上书倡导依宪治国之路”的专业性框架;而都市报则采用“一篇报道废止一部恶法”的媒介权威性框架。^[6]媒介记忆框架不仅在媒介内部有所区别,在国际之间也有所区别。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报道中,中国以“创伤”为框架,围绕历史之痛和现实之伤展开记忆;日本以“质疑”为框架回避加害事实;英美则以“冲突”为框架,强调事件的新闻价值。^[7]媒介既可通过回忆性框架的设定重新定义历史事件,形塑集体记忆;也可以在回忆叙述中将不同框架的报道进行融合,使不同群体的差别记忆得以统一。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赋权,受众通过分享个人故事和感觉,公开融入自己的态度、道听途说、情感等证据,在记忆建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网民通过角色转换、重新界定、脱离语意流等形式重构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记忆。^[8]

综合已有文献可知,既有的媒介记忆研究多以案例研究为主,本文也将延续这一传统思路。既有的研究多以“事件”记忆为主,探讨“广州湾”这样的“无事件境”记忆的新媒体建构对于媒介记忆研究将是一个补充。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在新媒体传播的环境下,参与建构“广州湾”地方记忆的各类微信公众号主体是否存在多样性,不同主体是否采用不同的记忆框架?第二,不同框架的背后反映各类微信公众号怎样的情感态度?第三,不同类型微信公众号之间的记忆建构对整个“广州湾”地方记忆传承有什么影响?

三、“广州湾”记忆的微信生产

微信搜索引擎中搜索“广州湾”,最早一篇涉及“广州湾”历史的文章出现在2014年3月,这与微信在大众中的普及时间基本一致。剔除一些只包含“广州湾”地名但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广州湾”历史背景知识的文章和重复性文章,笔者共获有效样本131篇,样本时间跨度为2014年6月到2019年6月。有效样本数量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微信普及的时间不算长,另一方面也确实说明“广州湾”历史在公共话语中的认知度并不高。

(一) 多元的记忆主体与较小的记忆形塑力

微信公众号文章的生产主体即记忆主体,“广州湾”记忆的生产主体主要包括机构公众号、传统媒体公众号和个人公众号。机构公众号不仅数量多且性质五花八门,既有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也有博物馆、出版社这样的文化机构;还有旅游、教育培训、摄影工作室甚至是海鲜销售等商业机构;既有湛江本地机构,也有来自广州、湖南溆浦、北京的外地机构。传统媒体公众号则主要来自本地媒体,分别是《湛江日报》《湛江晚报》和门户网站碧海银沙。个人公众号共有12个,从公众号简介上大多无

法判断其个人的人口学特征。机构公众号整体数量最多，共25个，但只有少数几个科研公众号和旅游公众号成为发文主力。其中，地方院校岭南师范学院主办的“广州湾研究”发文56篇，占比43%；“湛江旅游”公众号发文5篇，是所有商业机构公众号中发文最多的。其他公众号发文的数量并不固定，大多在一到两篇之间。传统新闻媒体中，《湛江日报》与《湛江晚报》的公众号具有党报性质，代表官方声音，两公众号共发文20篇，占比15%；碧海银沙新闻门户网隶属湛江电信，其公众号发文14篇，占比11%。

从文章阅读量来看，由于微信传播的“圈层效应”，上述记忆主体所生产的记忆文本阅读量普遍不高。发文最多的“广州湾研究”公众号，其阅读量平均在200—300之间。日报和晚报的公众号近两年的阅读量平均在1000左右，旅游公众号的阅读量与之不相上下。其他类型公众号与个人公众号的阅读量一般不超过100。新媒体虽然赋予个人参与地方历史记忆建构的渠道，但由于历史资源和能力的匮乏，个人并未形成“广州湾”记忆建构的重要力量。换言之，许多历史学者、见证人等记忆承载者并未通过新媒体参与到“广州湾”的记忆建构中。

（二）集中的“记忆之场”与缺失的“热点时刻”

“记忆之场”是“实在、象征和功能的场所”，不仅指能够唤起回忆的物理空间，也指能够唤起回忆的“抽象创作”。^[9]对于“广州湾”记忆而言，“记忆之场”指的是“广州湾”时期遗存的历史建筑。媒介通过建筑照片将物理空间的记忆之场转化为记忆意象，借由意象激发回忆，在媒介空间中建构起相应的镜像记忆场所。

在“广州湾”的记忆文本中，出镜率最高的记忆场所是“广州湾”法国公使署。它作为民俗文化活动、文化保护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名人影展等活动举办地出现在党媒公众号中；它作为地方旅游“打卡圣地”出现在各种商业机构公众号和个人公众号中；它的旧日影像也作为历史证据出现在学术公众号中。不同性质的微信公众号在不同语境中对它进行迥异的修辞：它时而是异域浪漫风情的地方再现，时而是地方殖民耻辱的苦难象征。类似的记忆之场还包括天主教堂、“广州湾”商会旧址、寸金公园，而其他众多“广州湾”时期的建筑遗迹，包括建设酒店、长法庄、大昌号、兵营等地，却因历史痕迹日渐模糊基本只出现在少量历史文化保护的报道中，记忆闪回的机会越来越少。

从微信文章的发文日期来看，记忆文本在12个月份均有出现，并未在某个月份或年份有特别突出的增长。过去的历史要重回当下的媒介视野，主要依赖“纪念报道、历史语境、历史类比”三大类。^[10]在“广州湾”记忆的微信生产中，大量样本依赖前两类。其中，纪念性报道只有两篇，分别是纪念抗法斗争胜利120周年的影展报道^①和《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纪念报道^②；剩下的历史语境类文章出现在包括旅游地介绍、会议报道、书讯、人物报道、文化活动报道中和大量的专业论文中。无论是纪念性文章，还是历史语境类文章，其发文的时间均没有固定重复性，缺乏仪式性“热点时刻”。这说明，“广州湾”历史记忆闪回缺乏固定的仪式活动作为由头，媒介无法建构从“过去”到“当下”的记忆桥梁，毕竟信息媒介生产关注的是“当下”和“此时此刻”。

这提醒我们，对于“广州湾”历史记忆的传承，除去“记忆之场”的保护与宣传，仪式性“热点时刻”的设立不应被忽略。

（三）记忆图景：主题与内容

131篇记忆文本主要涉及四大类主题：一是历史建筑遗迹，包括建筑的历史缘由、功能和变迁，既

① 湛江晚报公众号。6年1万多张照片记录“广州湾”建筑。https://mp.weixin.qq.com/s/EVHj4ePxIBB95NDt5jn1WA.

② 中国国家历史公众号。历史上的今天 1899年11月16日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2015-11-16, https://mp.weixin.qq.com/s/kWbWWcFzIA5ECZYIli0eVA.

有文化宣传的意味，又有旅游推荐的性质。二是文化报道，包括会议、书籍和电影推介等，历史记忆往往出现在活动或产品的介绍语境中。三是历史旧闻，注重旧闻的趣味性和故事性，包括名人逸闻、历史传奇等。四是专业论文研究和史料。前两类是过去和当下交汇，但侧重当下，后两类则完全是对过去的叙述。其他无法归入四大主题的文本，全部归于其他。

从数量来看，建筑遗迹类的文本共 38 篇，占比 29%。文化报道类共 21 篇，占比 16%。历史旧闻共 21 篇，占比 16%。研究论文与史料共 32 篇，占比 24%。其他类型的文章共 19 篇，占比 15%。

用记忆主体与记忆主题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历史遗迹类的文本生产主体主要是三大传统媒体公众号（“广州湾研究”公众号、《湛江日报》公众号、《湛江晚报》公众号）和各类商业机构公众号；前者发文 17 篇，后者发文 14 篇。无论是代表地方政府的传统媒体，还是营利目的鲜明的商业机构，都看到了作为记忆载体的历史建筑具有的经济文化价值。不同的是，党报公众号在提倡打造历史文化名片的同时也不忘呼吁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机构和个人公众号也参与了记忆文本生产，但数量较少，特点是将历史建筑作为传承爱国主义情怀的载体。文化类报道文本的生产主体主要是传统媒体公众号和学术研究公众号，两者均依赖学术会议和重要学术发现来连接“广州湾”的历史记忆，学者是两者共同依赖的记忆传承人；除此之外，传统媒体还依赖历史见证者、民间收藏者、地方文化爱好者、政府官员等作为记忆传承人。

从记忆内容上看，大多记忆文本把“广州湾”记忆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法国租借时期，二是法国与日本共同治理的抗日战争时期，三是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反复提及的记忆内容主要包括：法国租借“广州湾”的过程、法国租界时期的基本状况、地方官民的抗法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湾”的特殊贡献和畸形繁荣；抗日战争结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地方城市的秩序转变和持续繁荣。不同记忆主体采取了不同的回忆叙述框架，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态度。

四、“广州湾”记忆的媒介叙述框架与情感态度

“框架是有组织的中心观点或线索故事”，其功能是“为一系列的事件提供意义”；媒介框架由“诠释包裹”和“框架装置”组成，前者指文本的主题思想，后者指一系列体现这些思想的特定符号，包括隐喻、举例、警句、关键词、图像等等。^[11]恩特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媒介框架的四种功能，即定义问题、原因分析、道德判断、建议措施，^[12]进一步补充了框架装置的类型。笔者根据上述框架装置，通过文本细读，总结了经济、教化和研究三种有关“广州湾”的媒介记忆框架。

（一）经济框架：异域风情的历史文化名片

经济框架的报道主题，以文化活动报道和带有旅游推介的历史建筑报道为主。“广州湾”的历史记忆作为背景材料联系过去和当下。在斑驳繁杂的“广州湾”历史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法国租借时期，法国人在当地留下的异域特色建筑和现代化建制遗迹；而有关法国殖民者对当地资源的掠夺、地方居民与外来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则被遗忘。

在经济框架文本中，法式建筑的浪漫细节被突出描写；现代化的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设施和居民生活被仔细回忆；文化名人和商贾大亨被视为增加城市文化资本的重要砝码，成为记忆的主要对象。建筑物图片作为异域风情最典型的记忆形象镶嵌在这类框架的文本中，“旧日繁华”“往日风情”“当年风貌”是对“广州湾”旧日形象的关键描述和主要慨叹。在与其他地方进行类比时，文本对标的是繁华大都市，“在当时广州湾是一座可与上海、汉口并列的城市”^①。名人记忆的目的不是回顾名人的历史功绩，而是为了突出“广州湾”曾经的特殊地位，用广为人知的作者和作品大名为地方历史文化底

① 湛江日报公众号。年轻“湾友”痴迷“广州湾”。https://mp.weixin.qq.com/s/kDMa7kKWQU_TS7WiBJ6XAQ。

蕴背书。闻一多及其《七子之歌》是被回忆最多的名人和作品，在经济框架中，闻一多作品中包含的悲愤之情和“广州湾”被强租的历史情境却被隐去；类似的，寸金公园的抗法雕塑不提“广州湾”时期的抗法斗争，只提郭沫若“一寸山河一寸金”之题词。

在经济框架的微信文本中，“广州湾”记忆的功能是引导读者将湛江想象成为一座拥有异域风情和丰富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带动地方旅游业、促进城市形象建设是经济框架欲说还休的目标。在旅游文化报道中，法国公使署、广州湾商会旧址等承载“广州湾”历史记忆的建筑，往往被当作人文地标与湖光岩地质公园、热带植物园等地方自然风景区并列；其文本标题常常带有旅游招徕性质的修辞，如“湛江必去的* *个景点”^①、“盘点湛江各个时期的经典建筑”^②、“你所不知道的湛江必让你惊叹！”^③等等。“广州湾”的历史遗迹夹杂在数量不等的各类景点中，景点数目越多，有关“广州湾”的历史记忆就越单薄。

“广州湾”被强租侵占的历史原因时常被这类文本所忽略，即便少数文本提及“被法国租借”的历史事实，也因缺乏背景介绍而使侵略史变成自然发生一样。对于这段记忆，经济框架提供的建议是鼓励受众通过“领略法式风情”的实地旅游和文本阅览，记住城市的“旧日繁华”。这类文本并不单出现在旅游商业机构的微信公众号里，还出现在官方媒体的微信公众号里。前者的文章可被视为旅游产品的软广告，文本目的是扩大旅游产品知名度进而提高销售量；而官方媒体的文章则应被视作是城市形象推介和城市居民认同感的建构文本，“广州湾”的异域风情记忆在官方看来是一张旅游文化名片、一座有待开发和利用的经济富矿。“广州湾”蕴涵的浪漫想象已被逐渐运用到商业地产命名、商业活动运营和民俗风情街的建设中。

正是经济框架中的功利目的，这类微信文本对于“广州湾”历史记忆的情感态度表现得模糊暧昧，尽管没有直抒胸臆的自豪表露，但过去被殖民的历史不被记忆，短暂而畸形的现代化进程被表述得像自然发生一样。“广州湾”的历史不单是为纪念，更多是为开发。

（二）教化框架：百年耻辱与地方振兴

如果说经济框架是记忆繁华而淡忘苦难，那么教化框架则正好与之相反，以法国和日本的侵占给地方带来的创伤与抗争记忆为主，即便文本不免回忆到旧日繁华，但文本的最终落点乃是通过对比突出苦难。

以教化框架为基本架构的记忆主题，主要包括旅游文化报道和历史旧闻两类。旅游文化报道与之前的文本不同，历史建筑或文物召回的是殖民耻辱与反抗斗争记忆。教化框架下的法国公使署，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身份被凸显；寸金公园的抗法雕塑附上了抗法斗争的来龙去脉；建设酒店、大昌号、长发庄等历史建筑的异域风情细节不再被强调，取而代之的则是异族管制下的畸形经济描述。历史旧闻里的名人轶事多是抗战时期文化名人为避难香港、桂林，途经“广州湾”之事，文本详述名人逃难途中的艰辛与悲愤之情。历史旧闻对“广州湾”时期医疗、慈善、经济、交通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描述与经济框架的描述大相径庭：政治上层层管制，压迫沉重；治安上五毒侵蚀，风气败坏；经济上畸形繁荣，短暂春天。^④在教化框架下，中国人民与外来殖民者的斗争成为重点，抗法斗争、抗日斗争的记忆得以浮现。革命先驱孙眉的革命活动，爱国商人许爱周和张明西的慷慨捐资，中共南路组织的抗

① 湛江日报公众号：湛江必去的24个景点你都知道吗？. <https://mp.weixin.qq.com/s/jfli2u70lHRX27jRoy7fEA>.

② 湛江日报公众号：太齐全！盘点湛江各时期的经典建筑，给每个湛江人收藏. <https://mp.weixin.qq.com/s/PVbSeVYMJ0paGwq8PvGecQ>.

③ 湛江日报公众号：你所不知道的湛江，看了让你惊叹！. <https://mp.weixin.qq.com/s/0fkG0e7DKQsKSGhzcX4PeQ>.

④ 中国国家历史公众号：历史上的今天 1899年11月16日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2015-11-16, <https://mp.weixin.qq.com/s/kWbWWcFzLA5ECZYIli0eVA>.

日游击战，遂溪和吴川等地的抗法烽火，这些在经济框架下被遮蔽的内容聚集到记忆的聚光灯下。

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压迫致使当地人民奋勇反抗，这是教化框架对“广州湾”历史的常规解释。至于受压迫的原因，许多文本追溯至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无能软弱、官员腐败和国家的贫穷落后，将“广州湾”的地方记忆融入整个中国百年耻辱的历史中，遵循一贯以来“落后就要挨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叙述逻辑。2015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人民出版社旗下的《中国国家历史》杂志公众号和“非常历史”公众号都将 11 月 16 日作为《“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纪念日，专门刊发了历史旧闻。这两个全国性媒体公众号虽然以历史旧闻的形式刊发文章，但发刊的特殊时机已经含蓄彰显了其态度。而地方公众号虽然没有在仪式时间发文，但往往在日常文本中借用他人之口表明“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会挨打”的历史态度。^①如果说经济框架下“广州湾”的记忆是为后世开发所用，那么教化框架下，记忆的功用则是“教育年轻一代牢记历史”^②，避免重蹈覆辙，并“从中受到启迪，以史为鉴，自强不息，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共同建设美丽、富饶的新湛江，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③。

正是教化框架中的“以史为鉴”价值，媒介对于“广州湾”记忆的重点在于苦难和斗争。“广州湾”的过去不再有异域风情的浪漫和现代化想象，不少文本更多流露了“耻辱”“悲愤”的情感。法国强租“广州湾”被比喻为“现代版农夫与蛇”^④。闻一多笔下“七子”之一的“广州湾”被类比同期租借的香港、旅顺、澳门，而不再被类比上海与汉口。然而，这类微信文本并不只停留于情感的宣泄，而是“希望湛江人民勿忘国耻，牢记历史，发奋图强，振兴家乡”^⑤，鼓励受众化耻辱和悲愤为力量，迸发出新时代高昂的斗争勇气与建设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教化框架的生产者并不局限于以《湛江日报》《湛江晚报》为代表的党媒公众号，像“湛江巡城马”这样的商业机构公众号，“广州湾历史研究”和“中国国家历史”为代表的专业公众号，“文新瞭望”和“GDOU 文传党韵”等高校公众号，甚至个人公众号都有参与。教化框架成为“广州湾”记忆建构中被最多微信公众号认同和使用的框架。

（三）研讨框架：多元与客观的历史态度

在“广州湾”记忆的微信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广州湾历史研究”公众号。该公众号主要发布涉及“广州湾”研究会议、书讯、史料以及专业研究论文。除此之外，少量历史爱好者个人公众号也参与生产了探讨性文本。

研讨框架的文本特征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记忆内容广度拓展至大众传媒较少关注的历史暗角。作为记忆场所的历史建筑，不局限于地标性的广州湾公使署，而是拓展至邮局、码头，甚至是已经消失的纪念碑和营房等其他公共建筑。日常生活记忆不局限于少数新奇的民俗器物，而是通过画报、照片、票据等史料拓展至政治经济生活场景乃至行政和司法管理体系。记忆的范围从国内拓展至国外，许多文本依赖来自法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的研究和史料证据。第二，记忆的深度超越故事层面的记忆，深入到事件或现象背后的制度、历史环境等方面的讨论。“广州湾”被强租不是简单归因于

① 湛江晚报公众号：“广州湾”历史民俗馆开门迎客 . <https://mp.weixin.qq.com/s/OdlBs1lcyc1juDeYiUpnVA>.

② “广州湾”历史研究公众号：飞虎队陈纳德遗孀陈香梅 “广州湾”被骗 心疼痛难百姓 . <https://mp.weixin.qq.com/s/3xvBXXXUDrslbUksLKDPVw>.

③ 野草堂公众号：方寸之地大讲堂——“广州湾”历史民俗馆侧记 . <https://mp.weixin.qq.com/s/8kq9W0pAq2qYyGpgE65l2A>.

④ 集邮人公众号：“广州湾”不是在广州 看看隐藏在邮票上的历史 . https://mp.weixin.qq.com/s/rNGWCmaFKOdB9gJ_NA7utw.

⑤ 湛江巡城马公众号：霞山“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有个难得一见的戏墨书画展 . https://mp.weixin.qq.com/s/16SLNaa_KMt87N0Shx941g.

“落后就要挨打”，而是当时国际地缘政治和势力平衡的结果。抗法斗争不局限于普通居民的武装反抗，而是拓展至清政府官员在地界、税制各方面的据理力争。第三，文本强调客观的学术立场。这类文本既不做呼唤式的旅游招徕，也不做口号式的情感动员，一切依赖数据和事实。对于各种事件和现象的界定、原因分析、评价、建议，这类框架文本不似前两类框架文本那样给出唯一答案。“广州湾”是“租界”还是“租借”？“广州湾”的经济短暂繁荣，是法国殖民政策的摇摆，抑或战争局势的转变？不同研究视角有不同答案，文本既不美化殖民者的统治政绩，也不隐瞒其中的问题。

对于“广州湾”历史记忆的态度，研讨框架的文本拒绝将“广州湾”历史记忆单纯地视为“耻辱”，认为这样“会错过对其他丰富多彩的历史面相的认识”，“去殖民化的各种行为既不利于保存历史证据，也不利于文化资源开发”；提倡一种新型的历史观，主张“在广州湾历史研究中应该同时借助社会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理论与方法，以期更加全面客观认识广州湾历史”^①。

研讨框架的文本生产者主要是学术机构，作者与读者大多是专业研究人员，微信文本的传阅量普遍较少，对广大受众影响较小。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通过向传统媒体提供信息来源，甚至是提供稿件的方式影响微信公众号的记忆生产。例如，澎湃新闻公众号刊登的法国学者安托万·瓦尼亚尔的文章《“广州湾”，法国在远东的半世纪困局？》就由地方学术机构联系提供。

五、结论与研讨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媒介记忆的理论出发，分析了各类微信公众号近年来对于“广州湾”地方历史记忆的呈现。

首先，参与“广州湾”记忆建构的媒介日渐多元化，但缺乏能设置受众“记忆议程”的强媒介。专业学术机构和商业机构的公众号在发文数量上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但鉴于微信传播存在的圈层效应，其面向大众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较传统媒体仍有一定差距。各类微信公众号在记忆生产的时间分布上并无特殊呈现，“广州湾”记忆缺乏仪式性活动构筑起的纪念桥梁，反而使学术机构的学术会议形成了定期让历史重返现实的“纪念时刻”，但学术会议的专业性致使其记忆生产场域尚未能向大众普遍铺展。而传统媒体公众号的城市形象宣传重任、个人公众号的生活经验展示、商业机构公众号的旅游景点推荐又都依赖少数几个作为记忆场所的历史建筑进行记忆文本生产。这说明“广州湾”记忆的传承需要发掘更多的记忆场所，且需要与仪式时间相联系，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各类微信公众号的记忆生产所用。

其次，“广州湾”记忆的叙述存在三种媒介框架，对“广州湾”历史的情感态度有不同呈现，记忆在其中发挥不同作用。传统媒体公众号、商业机构公众号常用经济框架，将“广州湾”时期的湛江建构为具有异域风情的繁华都市，侧重对记忆的开发使用，淡化历史记忆中的负面信息。教化框架则广泛存在于各类微信公众号中，将“广州湾”记忆融入中国百年耻辱的历史记忆中，延续“落后就要挨打”的记忆逻辑；强调历史中的外族压迫与对外抗争，将当代奋斗视为斗争的延续；侧重于记忆的借鉴作用，将记忆作为参与中国梦和地方建设的原始动力。研讨框架则主要存在于学术机构公众号和个别历史爱好者的个人公众号中，记忆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前两者高，能够照亮许多记忆暗角，提供许多不被大众所注意的信息，在情感态度上强调客观看待历史。三种框架同时存在于各类微信公众号对“广州湾”记忆的建构和传播中。从微信传播来看，学术机构公众号发文数量最多，且发文周期稳定，研讨框架使用最多，但传播范围有限；教化框架使用最为广泛，说明以史为鉴的记忆模式依然

^① “广州湾”历史研究公众号：书写怎样的“广州湾”历史：《“广州湾”简史》预告，<https://mp.weixin.qq.com/s/D7QK5NgmL1T-xCog5nvbEQ>。

是主流意识形态；经济框架使用范围和影响力都较广，且阅读量较高的文章基本都属于旅游报道类文章，这说明以旅游文化活动作为载体是提高“广州湾”记忆公众辨识度的最有效途径，但目前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旅游活动策划，记忆文本基本停留在景点介绍上。

最后，少数外地媒介公众号参与了少量的“广州湾”记忆文本的生产，包括专注越南历史文化交流的“知越”公众号，湖南溆浦的“溆浦经典”公众号，广州的“岭南出版社”“广州旧闻”“信息时报”公众号，北京的“中国国家历史杂志”公众号，以及少数个人旅游者公众号。这些公众号文本与“广州湾”记忆的联结节点呈多样性，有的是历史文化交集，有的是名人经历交集，有的是个人经历交集，有的则是历史物件交集。“广州湾”记忆的传播与建构主体依旧是本地媒介，外地媒介的参与并未对已有“广州湾”记忆建构形成竞争关系，反而起到了记忆扩散与历史证实的作用。这主要因为本研究涉及的媒介基本都是国内媒介，如果未来有可能把法国、日本甚至越南的媒介纳入考量，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参考文献：

- [1]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 郭金华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45.
- [2] Edy, J. A. (2006). *Troubled Pasts: News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Social Unres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 2.
- [3] Young, J. E. (1994). The Texture of Memory - Holocaust Memorial and Meaning. *Art Journal*, 53 (1): 102-103.
- [4] Robins, K. & Aksoy. (2000). A. Deep Nati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Turkish Cinema Culture. In Hjort, M. & Mackenzie, S. *Cinema and N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3-221.
- [5] Kansteiner, W. (2004). Viewers and Statistics: Television History, Television Audience Research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West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 (4): 575-598.
- [6] 张志安, 甘晨. 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 (1).
- [7] 余霞. 全球传播语境中的国家创伤与媒介记忆——中、日、美、英“南京大屠杀”相关报道 (1949-2014) 的内容分析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5).
- [8] Jones, S. & Gibson, P. L. (2012). Remediation and remembrance: “Dancing Auschwitz” collective memory and new media.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5 (10): 24.
- [9] [法] 皮埃尔·若拉.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M]. 黄艳红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0-28.
- [10] Edy, J. A. (1999). Journalistic 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 (2): 71-85.
- [11] Gamson, W. A. (1989). News as Framing: Comments on Graber.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 (2): 157-161.
- [12]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4): 51-58.

[责任编辑: 赵晓兰]